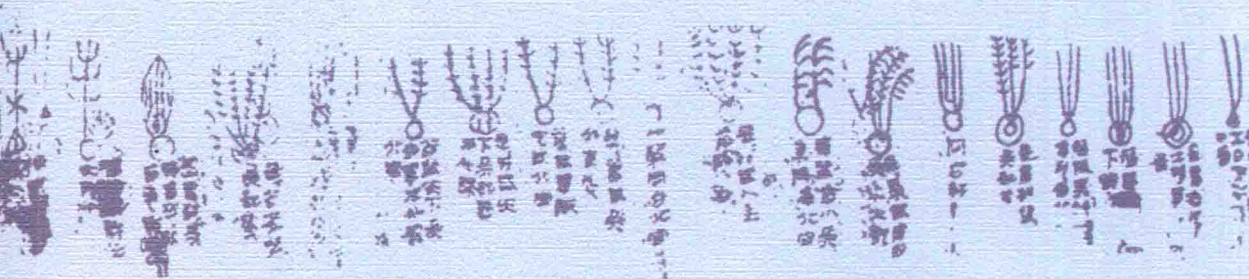




鼓楼史学丛书·区域与社会研究系列



星占学 与汉代社会研究

The Research of Astrology
and the Society of the Han Dynasty

甄尽忠 ○ 著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鼓楼史学丛书·区域与社会研究系列



星占学 与汉代社会研究

The Research of Astrology
and the Society of the Han Dynasty

甄尽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占学与汉代社会研究 / 甄尽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 - 7 - 5203 - 3335 - 1

I. ①星… II. ①甄… III. ①占星术—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B99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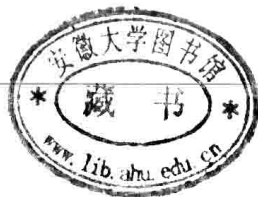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372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特约编辑 陈夕涛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5
字 数 404 千字
定 价 95.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星占学与汉代社会研究》（项目批准号：15YJA770023）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文星占与汉代政治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BLS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一 “观象授时”与“占候吉凶”：先秦两汉时期 天文学的二重功能	(1)
二 学术史回顾与梳理	(20)
三 研究思路、方法和目标	(30)
第一章 汉代的天文机构、职责及星占学在汉代民间社会的发展	(33)
第一节 汉代的天文机构、职责及天文官员在政治中的作用	(33)
一 汉代天文机构的设置及历史演变	(34)
二 汉代天文机构及官员的工作职责	(40)
三 天文官员在两汉政治运作中的作用	(46)
第二节 天文星占在民间社会的发展	(55)
一 天文星占学在汉代民间社会发展的状况	(56)
二 政府选官政策的激励作用	(61)
三 天人感应思想的泛滥进一步促进了天文星占在 民间的发展	(65)
第二章 汉代星占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政治中的运用	(70)
第一节 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在汉代的发展及其 在政治中的运用	(70)
一 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在汉代的发展与定型	(71)
二 汉代的分野占验与事应	(78)
三 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在汉代政治中的运用	(83)
第二节 汉代的星官体系及其政治作用	(89)
一 汉代的星官体系及其等级特征	(89)

二	星官占辞、含义及事应	(95)
三	汉代星官体系的政治功能	(100)
第三章	汉代的日食及其政治、社会影响	(109)
第一节	汉代的日食观测及占辞	(109)
一	汉代的日食观测与记录	(109)
二	日食占测及事应	(118)
第二节	日食发生后汉代帝王的修德、修政措施及禳救礼仪	(124)
一	日食与汉代帝王修德制度	(124)
二	日食发生后的修政举措	(126)
三	针对日食的禳救礼仪	(135)
第三节	日食与汉代的权力博弈	(137)
一	日食与汉成帝时期的权力斗争	(137)
二	日食与王莽重新回朝执政	(141)
三	日食与东汉时期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	(142)
四	借日食提出政治见解和改革建议	(145)
第四章	汉代彗星、流星星占及其政治影响	(149)
第一节	汉代彗星星占及其政治影响	(149)
一	汉代彗星出现的状况及时人的认知	(150)
二	汉代彗星星占的内涵及象征意义	(159)
三	彗星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167)
第二节	汉代流星星占及其政治、军事影响	(173)
一	汉代的流星观测与记录	(174)
二	流星星占及事应	(180)
三	流星的政治、军事影响	(186)
第五章	汉代的北斗信仰和云气占及其社会功能	(189)
第一节	汉代的北斗信仰	(189)
一	斗转星移, 观象授时	(190)
二	主宰生杀, 持人命籍	(193)
三	人君之象, 德行所系	(195)
四	北斗所击, 不可与敌	(199)

第二节 汉代的云气占及其政治功能	(202)
一 云气的分类	(202)
二 云气占辞与事应	(207)
三 汉代占候云气的机构和方术	(213)
四 云气占候在汉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220)
第六章 五星星占及其政治功能——以荧惑、太白星占为例	(227)
第一节 五星星占总论	(227)
一 五星失行	(228)
二 五星色变	(230)
三 五星合聚	(231)
四 五星失次对汉哀帝即位之初的政治影响	(233)
第二节 汉代“荧惑”星占及其政治功能	(234)
一 汉代对“荧惑”的占候与崇拜	(234)
二 重大“荧惑”失行天象的星占解读	(238)
三 荧惑星占对汉代政治运作的影响	(245)
第三节 汉代太白星占及其军事、政治影响	(249)
一 太白星占及其象征意义	(249)
二 重大太白“失行”天象的星占释读	(252)
三 太白星占对汉代军事决策、政治运作的影响	(256)
第七章 汉代的星神祭祀及其社会功能	(260)
第一节 “太一”祭祀	(261)
第二节 祭祀日、月、星辰	(266)
一 朝日夕月	(266)
二 星神祭祀	(267)
三 灵星祭祀	(268)
四 寿星祭祀	(269)
五 风伯、雨师祭祀	(270)
六 司命祭祀	(271)
第三节 汉代星神祭祀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涵	(273)
一 神化皇权，维护统治	(274)
二 祈福禳灾，迎吉纳祥	(276)

三 祈祷丰年，时和岁稔 (279)

第八章 星占学对汉代文学和社会风俗的影响 (282)

第一节 星占学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282)

一 汉赋中的天文星占意象 (282)

二 天文星占与汉代诗歌的生成 (292)

第二节 天文星占与汉代社会风俗 (296)

一 天文星占与汉代择日习俗 (296)

二 天文星占与汉代墓葬习俗 (302)

第九章 从“恪谨天命”到“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思想从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嬗递演变 (314)

第一节 从“恪谨天命”到“天命靡常” (315)

第二节 天事恒象 (320)

第三节 从“天人合策”到“天人合一” (330)

第四节 两汉时期天人感应思想述评 (337)

一 天人感应思想的立足点是为了“民” (337)

二 约束君权，缓和社会矛盾 (339)

三 天人感应思想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和諧 (340)

参考文献 (345)

绪 论

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主要继承了古希腊的天文学体系”^①。但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有其自身独立、完整的发展路径，“无论就性质还是就功能而论，都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迥然不同”。^②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世界天文学史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源头，并独具鲜明的特色和风格。

一 “观象授时”与“占候吉凶”：先秦两汉时期天文学的二重功能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先秦两汉时期天文学的功能，一直被界定为“观象授时”，即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确定四季，服务于农牧业生产这一个层面，更多地侧重于考察其“科学”属性，这几乎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古代史权威教科书一致性的结论。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积累起来。”^③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认为：“古代天文知识和历法的发展，跟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④ 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上册）也认为：“农业生产与季节气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就是在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中逐步发展起来的。”^⑤

随着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其所蕴含的人文属性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重视，开始由“边缘地带”走向学术研究的中心，由此又引

① 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天文与历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 江晓原：《天学真原》，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2页。

④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⑤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发关于古代天文学功能的争论。部分学者更多地关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政治属性和星占功能，否认其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基础性作用。江晓原先生认为：先秦两汉时期的天文学，“不折不扣，即今人所谓之星占学也。而与‘农业生产’之类扯不上任何关系。”^①他又指出：“所谓‘敬授人时’，绝非现代流行论著中所解释的‘安排农来生产’云云，而是指政治活动的安排。”^②台湾地区学者黄一农认为：“星占是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古代天文透过星占影响政治，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相当突出的特质。”^③钮卫星认为：“有人将‘敬授人时’解释为安排农事活动，并认为这是古代历法存在的主要目的，但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篇记载的天子‘敬授人时’的活动，几乎与‘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关系；其次从中国古代历法的内容——对行星运动的推求、对日月食的推求等来看，大都与‘农业生产’无关。”^④刘韶军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实即占星术。……中国古代所谓天官书或天文志，实际上都是占星术著作。”“在古人心目中，天官或天文之学，绝非今人头脑中的天文学，而是以占星术为主旨的一门学问和技术。”^⑤邓可卉也认为：“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文’，究其含义和性质，实际上就是星占。纵观历代官修史书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不难发现，其中的内容皆为典型的星占学文献。”^⑥

章启群先生通过考察先秦两汉时期天文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后认为：“至少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天文学，目的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表达了一种农耕社会的宇宙观，基本上没有受到占星学的影响，不属于‘政治天文学’。”“大约从春秋末到战国初开始，中国天文学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折：试图论证人间帝王统治的合法性，用天象反映人间社会的等级制度。”“占星学正是由此脱颖而出。”“从本质上说，这时候的天文学家实质上已成为占星家。”^⑦

星占学（或称之为占星学、星占术、占星术），“是观察天体的运行变化，预言人间吉凶祸福的一种方法”。“包括恒星占、五星占、日占、月占、

① 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② 江晓原：《天学真原》，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③ 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④ 钮卫星：《天文与人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⑤ 刘韶军：《古代占星术注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1页。

⑥ 邓可卉：《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⑦ 章启群：《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9、63页。

日月食占和异常天象占等。”^①《周易·贲卦·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上》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②“观象授时”，是制定历法；“占候吉凶”，即“根据天象的变化来附会人事，预测吉凶”。^③其功能是通过星占体现出来的，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最核心的两项基本功能。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④对此，冯友兰先生指出：“‘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是天文学；‘纪吉凶之象’就是占星术了。在古代，天文学和占星术是混在一起的。”^⑤

早在1987年，席泽宗先生就指出：“在中国，天文学是随着农业生产和星占两种需要而诞生的。”^⑥尤其是在先秦两汉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肇始、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两大功能始终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这既缘于农耕文明的社会特质，也是取决于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完整揭示出上古时期天文学的全部内容和本质要义。

（一）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古代天文星占学的肇始阶段

中国早期天文学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孕育和产生，新石器时代大河村文化“彩陶上的太阳纹、日晕纹、月牙纹、星座纹等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⑦。但从原始宗教的角度来看，也不排除当时人们

① 陈久金：《中国占星术的特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1期。关于星占学（或占星学、星占术、占星术），学者们曾下有不同的定义，不过内容大同小异。鲁子健认为：星占学是“古人根据观察天象变化以占卜人世吉凶祸福的数术”。参见鲁子健《中国历史上的占星术》，《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2期；郑小江认为：占星术“是一种根据天象（主要是星象）来预卜人间事务的方式”。参见郑小江主编《中国神秘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江晓原认为星占学“是一种根据天象来预言人世间的吉凶祸福的方术”。参见江晓原《中国星占学类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章启群认为：占星学“是星相学家观测天体、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各种变化后，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事物的一种方术”。参见章启群《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2页。

②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0、247页。

③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65页。（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引《汉书》皆出此版本。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8页。

⑥ 席泽宗：《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参见方励之主编《科学史论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196页。

⑦ 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对日月星辰等天象的崇拜。如与大河村文化同时期的庙底沟文化，在出土的彩陶盆上绘有火焰形图案，王震中先生称之为“星火”彩陶纹样，“反映了大火星祭祀的情景”^①。2005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镇发现距今约4100年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遗址——陶寺观象台^②，“它的功能包括观测日出方位确定季节，以制定历法，即所谓的‘观象授时’”。^③但陶寺观象台又是“一个集礼仪祭祀和观象授时为一体的建筑”，“对于早期先民，这样一个集天文观测、观象授时、太阳崇拜和礼仪祭祀的建筑，是符合历史背景的”。^④

从时间上来说，陶寺观象台相当于帝尧时期，不少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是不是帝尧时代的都城，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如《国语·楚语下》载：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⑤。《世本·作篇》载，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奥区占星气”^⑥。及《尚书·尧典》所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饗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⑦

① 王震中：《炎帝族对于“大火历”的贡献》，参见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五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② 关于陶寺观象台的年代，在此以武家璧、陈美东、刘次沅等先生的考证为准。“结合考古学各方面信息，该建筑建于陶寺中期（大约公元前2100年），毁于陶寺晚期。”参见武家璧、陈美东、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功能与年代》，《中国科学G辑：物理学、力学、天文学》2008年第9期，第1265—1272页。

③ 武家璧：《陶寺观象台与考古天文学》，《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④ 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学分析》，《天文学报》2009年第1期。

⑤ 《国语·楚语下》，第562页。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引《国语》无特别说明者皆出此版本。

⑥ 《世本》（王谟辑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页。

⑦ 《尚书·尧典》，第119页。（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下引《尚书》皆出此版本。

帝尧对天文观测如此重视，其原因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通过观测鸟、火、虚、昴四宿在黄昏时出现在南中天的时间来确定二分二至，划分季节，指导社会生产和生活；其二是“钦若昊天”，即对上天的尊敬和崇拜。江晓原先生指出：“谈帝尧为政的225字中，关于天学事务竟占了172字，即76%。”“这至少说明：在古人心目中，帝尧的这项政绩比任何其他政绩都要重要得多。”^①

“钦若昊天”，《史记·五帝本纪》记为“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曰：“而独言昊天者，以尧能敬天。”《五帝本纪》又载：“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②“以观天命”，即观察上天的旨意。“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九字，源出《尚书·舜典》，孔颖达疏：“七政者，日月五星也。”“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③这九个字但究竟何意？几千年来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解释歧异，未有定论，但无疑都与天象观测有关。《史记》裴骃集解引郑玄曰：“璇玑玉衡，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④《史记·天官书》曰：“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司马贞索隐引马融云：“璇，美玉也。机，浑天仪，可转旋，故曰机。衡，其中横筒。以璇为机，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引郑玄注《大传》云：“浑仪中筒为旋机，外规为玉衡。”又引马融注《尚书》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也。”^⑤

由此来看，“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主要是通过观测北斗或日月五星运行是否正常来判断政事的得失，这也是古代星占学理论最根本的宗旨。尧、舜在禅让时都不忘嘱托继任者一句“天之历数在尔躬”^⑥。其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权力来自上天的赐予，承载着天运之命数，也只有

① 江晓原：《天学真原》，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2页。

②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0、28页。（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下引《史记》皆出此版本。

③ 《尚书·舜典》，第126页。

④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9页。

⑤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1542页。

⑥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1502页。此句话在《论语·尧曰》中也曾提及。“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参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7页。下引《论语》皆出此版本。

他们才能掌握“绝地天通”的通天之术和权力。

（二）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天文星占学的初步发展阶段

夏代的历法是非常成熟的。孔子就一再说要“行夏之时”^①。今天民间使用的农历仍被称为“夏历”。《史记·夏本纪》载：“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② 现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文相传是夏代的遗书，也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文献，这一点已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竺可桢先生认为：“《夏小正》一书，虽疑为后人所伪撰，且所记天象如‘八月参中则旦’，‘十月初昏南门见’，均与事实矛盾。但大体言之，其星宿位置较《吕览》、《淮南子》为早。赤经相差约一小时，为距今三千年前之现象。”^③ 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见从晚周到汉代，人们都认为《夏小正》确与夏代有关。学者认为《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是合乎实际的。”^④

《夏小正》是否为夏代的历法，虽然史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在天文学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夏小正》就是夏代的历法，或者说至少是起源于夏代。陈遵妫先生认为：“《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法。它根据天象、物候、草木、鸟兽等天然现象，定季节、月份，还记有各月昏旦伏见南中的星象，并指明了初昏斗柄方向和时令的关系。尽管此书作于西周至春秋末叶之间，也可能为春秋前期杞国人所作或春秋时居住夏代领域沿用夏时者所作，但其中一部分确信是夏代流传下来的。”^⑤ 罗树元等人根据岁差理论考证后认为：“《夏小正》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即我国夏代的历法，不是伪托。它先靠口头流传，约在春秋前形成文字。它的天象记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时代的天象。”^⑥ 潘鼐认为：“《夏小正》的成书虽然在东周较后的时期，然而其中的天象资料，却确是夏代的。”^⑦

清代学者王筠释《夏小正》之“正”字曰：“正盖政之古文，非正朔之

① 《论语·卫灵公》，第164页。

②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109—110页。

③ 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参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245页。

④ 李学勤：《夏小正新证》，参见《古文献丛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⑤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0页。

⑥ 罗树元、黄道芳：《论〈夏小正〉的天象和年代》，《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5年第4期。

⑦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正也。”^①《夏小正》是一个星象物候历，其作用首先是为了观象授时，对其后的《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历法，而是融星象、气象、物候、农事、田猎等内容为一体的混合历，体现出天、地、人、物相统一的理念，重点是根据星象来安排各项农事活动。

由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的《中国天文学史》认为：“到了阶级社会，原始迷信和神话传说的成分却变成相当细致的星占神学。”^②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夏代对异常天象是极为重视的，现在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日食记录是夏代的仲康日食^③，有关情况在《尚书·胤征》中有明确的记载：“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胤征》虽为伪古文，但这条史料确是可靠可信的，并不是伪记。《左传·昭公十七年》太史昭子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④这两条记录文字基本相同，前者应该是取自后者。一次日食竟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慌乱，主管天文历法的官员羲和因酗酒失职，“昏迷于天象”而被处死，说明当时不仅极其重视天象的观测，而且已经把日食视为严重的不祥之兆。

陈遵妫先生指出：“我国大概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已经萌芽了。由于奴隶主阶级的提倡，占星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代的许多甲骨片就是占卜用的，其中有不少天象纪事，正是占星术发达的证明。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巫咸就是商代著名的占星家。”^⑤殷墟卜辞中有丰富的天文记录，既有天文历法的内容，也有星象纪事、对异常天象占卜的内容。

在天文历法方面，“从已出土的有关天文历法的资料来看，殷代已有了一定水平的历法”。^⑥“商代实行阴阳合历，纪日以干支，纪月以朔望，纪年以四气，并以闰月调整太阴年与回归年的周期差。十月为旬，每月或分上、

① (清)王筠：《夏小正正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②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③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四次可供参考。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1页。

④ 《左传·昭公十七年》，第1385页。参见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引《左传》无特别说明者皆出此版本。

⑤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⑥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中、下三旬。”^①

商人还尤其崇拜北斗、南斗。如

壬寅二斗，蒸亡尤？ 前4·20·6

鬯于二斗惠……？ 宁3·233

庚，从斗诅雨？ 合362

夏渌先生指出：“甲骨文中有二斗字，大斗为北斗七星，小斗（后转化为升），当为南斗六星。商人特加崇拜，除了指示方向，还以斗柄的变化，指示四季，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倍加尊重。”^②

除此之外，商人崇拜二斗，还与二斗与人间事务有某种联系有关。章鸿钊先生在《殷人祀北斗考》中列举多条相关卜辞，这些卜辞多以“王受佑（祐）”结尾，章先生认为，这说明殷人“视二斗主人主休咎与天下安危”^③。

同样，在卜辞中，还有关于日食、月食等异常天象的占卜^④。

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

《合集》11485

癸亥贞：旬无祸？旬壬申，夕月有食。

《合集》11482 正一反

壬寅贞：月又（有）哉，王不于一人祸？

《小屯南地甲骨》726

庚辰贞：日又（有）哉，非祸？唯若？

《粹》55

乙丑贞：日又（有）哉，其告于上甲？

《合集》33697

辛巳〔贞〕：日蚀在西，亡祸？

① 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页。

② 夏渌：《释甲骨文春夏秋冬——商代必知四季说》，《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

③ 章鸿钊：《殷人祀北斗考》，参见《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④ 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记载日食的卜辞有七条”，“有七条卜辞记录五次月食”。参见杨升南、朱玲玲《远古中华》，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97、599页。

戊申贞：日有𠄎，告于河。

《小屯南地甲骨》726

“𠄎”，郭沫若先生释曰：“‘日𠄎’，若‘日又（有）𠄎’，当是日之变，因有此变，故卜告于河，卜告于父，以稽其祲祥。𠄎与食音同，盖言日蚀之事耶？”^① 郭沫若先生的这一推断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冯时先生认为：“‘𠄎’与‘蚀’的音义确实十分吻合，这意味着卜辞的日、月有𠄎均指日、月食，它们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日、月有蚀。”^②

孙小淳指出：“星占是占卜天意的一种重要方式。”^③ 而星占家最为关注的，首先就是日食和月食，这是人人凭肉眼都能看到的异常天象，其他星宿运行的细微变化没有一定的天文知识和长期的观测是察觉不到的。殷人迷信天命，占卜日食、月食的主要目的是“稽其祲祥”，不少占卜日食、月食的卜辞都与“祸”字相连，这说明他们已视日、月食为重大灾祸的前兆，所以才非常虔诚地占卜，“告于河”，向河神祈祷，以求免灾。故冯时认为：“特别是卜辞中的日食记录，不仅涉及了见食时间与见食地点等日食预报的内容，而且也关乎奇异天象吉凶的分辨。”^④ 而这正是“占候吉凶”功能的具体体现，也说明在殷代星占学已相当发达。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出土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利簋”，在簋腹内底铸有4行32字铭文，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旒公宝尊彝。

利簋及其铭文的重要意义在于用实物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解》《战国策·赵二》及《史记·周本纪》等文献中关于周武王在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68页。

② 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③ 孙小淳：《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作用》，《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

④ 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页。